

中国现代 新诗序集

(上册)

周良沛 著



海天出版社

序集

ZHONGGUOXIANDAXINSHIXUJI

中国现代新诗序集
(上册)

周良沛 著

海天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国现代新诗序集 / 周良沛著. 深圳 : 海天出版社, 2006

ISBN 7-80697-810-0

I. 中... II. 周... III. 序言—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1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6)第 076578 号

海天出版社出版发行

(深圳市彩田南路海天大厦 518033)

<http://www.htph.com.cn>

责任编辑: 周鸣琦 徐丹娜

责任技编: 钟愉琼 封面设计: 张幼农 装帧设计: 海天龙

深圳市海天龙广告有限公司设计制作输出 Tel: 83461000

深圳市金星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海天出版社经销

2006年9月第1版 2006年9月第1次印刷

开本: 787mm×1092mm 1/16 印张: 73.625

字数: 1300千字 印数: 1-2000册

定价: 120.00元

海天版图书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海天版图书凡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随时向承印厂调换。



周良沛1933年11月19日出生于浔阳江头，祖籍为中国土地革命时期井冈山中心地区的永新县。若说抗战时他从小随学校流亡读了深刻的人生大学，那么，1958年错划“右派”在劳改队“改”了21年，已在他复出后的近30年间诗文的历史、辩证唯物中，看到他那时深读人生的另一种人生。

周良沛创作的诗集、诗论集、散文集、长篇传记等的数目繁多，编选外国的、“五四”后的、港台不同风格作品，仅为其所写的序跋等文字，除本书的百多万字，仍有不少。

作者现为国际笔会中国中心成员，香港《海岸线》执行编审，中国作家协会台港澳暨海外华文文学连络委员会委员等职。

一部活的中国新诗史

答诗人谭建生十问

■谭建生 ○周良沛

■ 《中国新诗库》颇多磨难，前后经历了十来年才出齐，如今为何又要集其每位的诗序出版，价值何在？

○ 《诗库》拖了十几年，弄得原来手植铅字打好的纸型都几乎不能用，也难印齐的惨状，自然是遇到由于财务、人事等等今日出版非畅销书仍要遇到的问题。但也有些别人所遇不到的情况。如出版基金会说为此拨出多少钱，有的又矢口否认收到一分钱，感到神秘兮兮时，偏偏又爆出涉金案的传闻，就更不是我能说清楚的问题，这也是很有这一历史时段特点的问题。当时，写信催问：请给一个交待，若照合同，我是可以上诉的，人家也是不理不问。新官不理旧事，也成规矩。作家告出版社，我也抹不下这个脸来。几年间，我也不知人员调配得谁上，谁下，谁走。周百义社长上任后，我知道他在北京组织名家座谈组稿时，不是一次，不止一人，都提到《诗库》这样的选题排好了都不能印完，还要组什么稿呢？此时，出版圈以有魄力、有能耐，在文化圈里没文化已不为怪时，懂文化的周百义同志在武汉各印刷厂已淘汰了用纸型浇版的设备下，上河南找到那些无力更换设备的小厂才把它全部印出面市。原先，还预算了几十万稿费，准备送给《诗库》中还健在国内的作者，后来考虑要与前几任领导对此的作法一致，才改为送书，此时此刻，个人的作用远胜于合同的作用。

这一出书过程，实际上也是对它价值认识的过程。

远在1988年，《诗库》还是以个人单本小册子出来时，前辈诗人冯至看了，还著文予以的扶持、鼓励，我是十分感动、感谢。他说做这一工

作，当是新诗建设的“功臣”，这不敢当。但他看每篇序言，对多年太多认识分歧的诗人之叙说、评价，认为有新意，还了历史的原貌，《华夏诗报》头版的出版消息，却用很大篇幅热情肯定它出现在诗界一股反民族传统的“新潮”中的意义，这都是我所追求和希望能做到的。1993年，《诗库》才印出头两集时，时在作家出版社主持常务工作的李荣胜同志找到我，请我在它出齐后，在没有、或可以解决版权问题时，将集中所收的诗人之每篇诗序交他汇集出版。他说：“那将是一部活的中国新诗史。”因为上世纪七八十年代之交的后几年，新诗空前活跃、繁荣，随之，诗坛有些“老大”，各树旗号，各立山头在“崛起”，文艺思想之混乱，无以复加。有人扬言“新诗是从我开始的”，历史混乱于虚无时，偏偏有不少诗史、诗选出版，除拉几个死人，用很少篇幅联起长长的历史空隙，自然都是新潮大餐。历史的评价，乐山乐水，历史的存在，则是任何势力都否定不掉的，哪怕千年万年。然而，文学史过去都是作品史。过去任一历史阶段的作品，在当代人的审美趣味下，他们自然有他新的审美选择，可也有必要知道那个时代和诗人的背景，才能懂得它当时之所以出现、产生影响，乃至成为经典的因果。何况，它也不光从正面推出名家和经典，为全面展示新诗运动的运行过程，同时也从负面看到它在今日仍有现实意义的经验教训。从开篇的胡适起，我们既讲他为新诗开路之功，同时不忘他对新诗之过。这就需要在书序中提供的有关资料，以及作者对它的解读。对此，我是尽量用资料说话的，一是关于作者自身的生平，一是关于作品的资料，有些作品，是诗为评传的，则尽量利用当时的“评”，一字不删地全文转引，它更能说明要说明的问题，我只希望自己作些资料的搜集和整理工作，为今日的读者多提供一些方便。荣胜同志对它如此的认定，对我是很大的鼓舞。可惜，书印齐后，他已调离出版社了，接手的人，不一定需要知道过去有过的计划，为此费神费事。作这些事，不是需要制度，是需要人。

同样，像催促它最后出齐的社会力量一样，专家、名家、朋友，不是几个，不是一次，希望汇集《诗库》中的书序出版。除了大致相同的意见，还提醒我：市场化淡化得社会读书空气不再浓时，真正能静下心来读书的人，每月可以买书的支出，实在有限，这么一大套书，对他们是个不小的负担，同时，这些人住房条件也差，有了书还没地方放，加以收集的作品，全是名家名篇，图书馆不难找，而书序中蒐集的每位诗人的有关资料，经过作者论述整理，便于阅读和查用的，找起来就不是那么方便了。所以，此书的出版又提到议事日程了。

■ 《诗库》编纂上千万字，涉及的原始资料，又是它的多少倍，应是新诗建设的一大工程，为何没有组织一个工作班子，而是你独立承担？

○ 说到这，需从《诗库》最初出版的构想说起。新时期，是从“四五”天安门诗歌所迎来它最初的曙光开始。上世纪七十年代末，虽然我的“右派”问题还没正式“改正”，但人民群众同新诗那么贴近、相依的感情，前所未为，史无前例。这时，我也写起诗来，先是寄往香港发，虽然和台湾的关系，看不到，也料不到以后会有松动的可能，香港的朋友也告诉我，台湾也有转载它的情况，并寄下剪报。那些短诗，从传统观念看，选材、写法，都是属于“非主流”性的，回避了习惯那么直露表现一些观念的写法，更注意生活给我直接的感悟和印象的表达，有些象征和隐喻。它更方便和海外读者的沟通，并保持有作品持续在外发表的一定数量。我很感谢吴其敏老先生，他对我写作的信任，是作者有种无法表达的情感。他主编的《海洋文艺》，我发出的稿，只要赶上发稿的时间，都是当即见刊。它有助于改善我未正式“落实政策”前的生存境况。也遇到令我深思的问题。如现在一些选本常选的《珍珠》，当时一同到海南的傅仇同志是看它手稿的第一人，评语是：“根本不是诗，都没有写‘通’！”这对我心灵是不小的震动，但没挫伤我写诗的积极性，我没有多大的写作自信，可也不认为写得像傅仇所说的那么糟。它还是在国内和海外多处刊出了，读者的鼓励也恢复了我一些写作的自信。傅仇是读过很多书、饱学的老实人，1959年建国十周年，国家为展示社会主义的文化亮点，他是所选出十位青年诗人各出一本《诗选》者，像京剧界从辈份说“大”、“小”的“四大名旦”、“四小名旦”，那时他们也誉为“十小诗人”，他多反映林区生活，亦称“森林诗人”。从他的为人看，他对我直率的批评，绝无恶意，但也是当时“主流”审美意识之惯性作用的必然。于是，我想为新诗爱好者突破这种太窄的审美趣味做点工作。由于历史诸多、复杂的原因，“五四”后在“现实主义”之外的“非主流”而上另册的诗人之诗风，早为国内读者生疏，他们的诗文，文科师生甚至在《新文学史》上读过对他们的“批判”，却没见过他们的作品，极不正常。同时为了恢复新诗历史原本的面貌，我用心地选编了戴望舒，虽然他诗风的“现代”而无法列为“主流”，但在政治上是过硬的爱国者，这样，在较宽松的政治空气下，容易说过去。徐志摩，无疑仍是“资产阶级”的代表文人，从历史唯物的观点，首先承认他历史的存在，也不因人废言，肯定他诗中一点爱国、健康的因素，也是说得过去的。胡也频作为“左联”五烈士之一，若对他作什么政治挑剔，都是罪过。但他的诗是受所谓的“象征”诗人李金髮式的“象征”之影响特深者。闻一多是知识分子爱国的先驱，但他的《红烛》《死水》毕竟是唯美的作品。稍后，还有外国的、二十世纪五十年代深受中国读者欢迎，此时还没给他摘去“修正主义分子”帽子的聂鲁

达，以及“象征主义”鼻祖波德莱尔那被列为世界名著的《不吉祥的花》（旧译《恶之华》），此时，将他们的作品首选为新时期送给广大读者的一束玫瑰，我想是个不坏的主意。

相对于传统的观念来说，这有些犯忌，要冒险；所以敢犯忌、冒险，是我在长长二十年劳改的日子里，很投入地读了不少1957年前看到会厌烦的社会科学的、马克思主义的书。懂得一点历史唯物的、辩证唯物的“主义”。如对徐志摩，我们在序跋中就曾事先有番劝告：不要对他的过去简单地否定又走到另一个极端。不幸言中，一阵“徐志摩热”后，有人就说中国只有三个半诗人中的首位，就是徐志摩。可要“突破禁区”，谈何容易？一般出版社，不敢接受这样的选题。然而，柳暗花明，有次和巴（金）老说到这事，他要我找他在四川出版局当局长的侄儿李致，问题就迎刃而解。在“解放思想”的大氛围下，自由地呼吸，顺心地办事。

这些书出版后，起码是在诗界，覆盖面在全国是很广的。有的重印到十多次，虽然那时还没搞市场经济，但在计划经济下有如此的市场效果，合作双方，皆大欢喜。

为此，国内的出版家，不少都知道我还是个敬业的编辑，手头有些资料。1986年，曾卓的诗集得奖，书的责编一同到北京来领奖。上宾馆看曾卓时，他告我，社里的胡天风同志和责编，请他先同我疏通“关系”，问问有没有可能替他编一套“五四”各流派诗人的个人小册子以普及新诗？我当即答应。原来责编是邱祥凯同志，1956年我搜集整理的《藏族情歌》在长江文艺出版社出版，初版面市的当月就重印，第二个月又再印，很受欢迎。由于“反右”，它没再印，更不可能得到宣传，很可惜。可此书的责编也是祥凯同志。世界太小了，山不转水转，三十年后又见面，又合作了。不需要谈什么条件，没什么条件好谈！

这样，赵国泰同志责编，每辑十个人，十小本，从1988年7月至1991年5月，三年编了三辑。包括“创造社”、“新月”、“现代”、“汉园三杰”等人的作品，郭沫若的《女神》虽然解放后已印的很多了，但“创造”的王独清、穆木天、冯乃超的“象征主义”，新一代的读者对他们就很陌生了。就是胡适、周作人、俞平伯这些老者的早期白话诗，今日的人读来难有兴趣，可解放后几十年没出版过，这也成个热点，销路不错，也有重印，同样，皆大欢喜，于心也安。

后来，接通知，要我上武汉，去谈《诗库》的事，当时那些薄本小册子，总称就是《中国新诗库》，对它，有什么好谈的呢？两个小时的商议，虽有飞机，也是千里迢迢。出版社有关负责人田中全、和穆熙开门见山，请我将现

在所出的这些小册子，按“五四”后的《尝试集》始，以每位诗人出道的先后为序，重新编印，精装、有气派地合起来出个十几集。这是出版界的一股风，以书的气派为自己树形象。将“五四”后新诗运动的有关作品系统、规模地作为一大工程，已远远超过、完善我最初托巴老想办法去印那么几本诗集之想了，何乐而不为呢？

这时，和穆熙提出，是否组织一个班子？

我问：准备组成一个多大的班子？准备请几位什么样的人？是大家都集中在出版社所在的武汉？还是事先安排好个人该做的工作，隔段时间在约定的地方交换看稿，沟通、统一意见再定稿？其间的吃、住、劳务、旅差的费用如何解决？

虽说此书耗资再大，出版基金都予以保证，可说到这些费用时，却无人开口了。那三十本小册子，按书的厚薄，多到百来元，少到几十元一本的稿费。分明不可能一个月编十本书，但十本书的稿费合在一起付，还得扣税金。对此，我没说任何话。但一个班子在一起，是多少开支，如此这般，能行吗？

对此，还是没有人说话。

好在小册子出了三辑，却编好五辑了。若按新诗运动中出道者的先后为序，拟好名单后，除将已编好的按序列进去，中间空缺未编的也新编补进去，那么，战前，不少抗战时出道的诗人也基本包括进去了，以后的三四集，要能另组班子搞，那又再说吧。

如此这般，真是无奈。开初，出版社还催的很紧，希望最好两年，不超过三年出齐。为此，我是放弃了一切创作，当时虽然还年轻，精力好，现在拿出那时的照片来看，比前比后，都瘦多了。没日没夜的干下来，如前所述，书却出不来了。叫天不应，叫地不灵。此时，我为无人相助长叹，此时，我又谢天谢地，还好没组班子。否则，怎么应付人家的吃、住和劳务费用？每一集印出来都是一千二百页左右，当时按二十行千字算，远远超过百万字计。书出了三月半载，才付酬，几千元扣了税，自己还得买些书。而所用的资料，解放前的书复印，除复印费还有沉重的资料费，每位诗人可用于《诗库》的，它和原始资料是不成比例的，除了托人，那时也没电脑查询，我还得到上海、京津等地的大图书馆求助。这样，以书养书都入不敷出。再有一个班子，以后的事还敢想吗？

后来，编另一本书，另一位还是合作者，请他复印了一张资料，他当场就要我付他一角五的复印费。此君“文革”前在京是位司局级干部，因故降级下放来的文化人。怎么会这样呢？想不明白。市场经济，让人学会如此的生

存之道，也不足为怪。自己不会这样，就得自讨苦吃。好在不急了，不催了，我也就一个人慢慢地穷对付地将后面的收尾工作全作干净了。心想，你不出，我捏有一份合同。这份合同，说来也怪，不是事前签订，而是出了两集后，寄两份事先没有任何商洽，责任、义务都印好而寄来的《合同》，请签了名寄回去就算给了我的一份法律保证。心想，你违约，我还可以告，可有那份“阿Q”，还横不下心来，直到有公众的舆论力量才解决了这个问题。

通览这一过程，若不一人承担这些工作，还能有别的办法吗？都是无奈啊！

不过，祸兮福兮，难以绝然，也有人说：这样，对诗运叙述的整体把握，有它一致的完整性，没有什么杂乱无章的不谐和处，也算坏事变好事。

■ 《诗库》仅收到开国前出道的诗人，也就是说，只收“现代”，“当代”缺席，是否应该再有续编？

○ 这里所说的1949年“十一”前的诗人，只是指开国前出道的诗人，不少都是更多成就于解放后，跨“现”、“当”代的。如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所称的“四大诗人”——贺敬之、郭小川、李季、闻捷，同样是中国新诗当代的代表人物。其他如“七月”的绿原、曾卓、冀沅、鲁藜等，“九叶”的辛笛、穆旦、杜运燮、陈敬容、郑敏等，以及独来独往的蔡其矫、苏金伞等，他们创作之活跃，质量的闪光，不少也是在他们跨代的“当代”。在当代蒙大冤、吃够苦的穆旦，去世前的一些诗，他的好友王佐良认为“可以放在他最好的作品之列”。绿原在个人不幸时，诗家有幸地写了《重读〈圣经〉》等作品。在新诗运动中，他们以各自的好作品传薪。李瑛、邵燕祥、公刘，解放前早慧于新诗，1947年和1948年各自写出颇有个人特色的短章，若非更活跃、闪光于当代诗坛，恐怕又难凭他们少时那点诗汇入《诗库》的行列。“五四”新诗开创时期的诗人俞平伯及汪静之等虽然一直到新时期还健在，但在解放前已不写或少写新诗了。二三十年代的冯至、艾青、臧克家、卞之琳等老一辈诗人于“当代”，都有不凡的诗绩。冯至几首叙事诗，既可列为他一生的代表作之一，也可视为那一时期新诗水平的标尺。而艾青，不仅写了好诗，数量也可观，评论家称为他的“第二高峰”。

这些跨代的诗人，“五四”后到“当代”，在新中国也是几代同堂。其中人健笔健者，《诗库》中已收进到他们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的作品了。由此，将《诗库》与1949年后的诗运截然分开，是不确切、欠妥的。

若按年代的顺序来，《诗库》之后的岁月，自然不能简单地予以诗的空白。《诗库》出齐，也有人请“长江文艺出版社”为其续编献策、张罗，有人问

到我，年岁不饶人，我是不可能参与了。不仅体力不支，不说“老年痴呆”，脑力也不够用，为此，只能十分抱歉。

何况，出版加速市场化以后，再想想《诗库》在出版过程中先后所折腾的十几年，《续编》投入市场的可能性究竟有多大呢？可以不忙回答，也不可轻易肯定。

从开国算起，“当代”已长达五十六年了，半个多世纪，中间是否还需要分段呢。有人主张以“文革”分线，这是否又科学呢？文学作品真正的裁判是时间，是历史，中间是需要一段时空的距离。若对眼前，乃至近年诗坛新秀予以定位，未免过于轻率和不负责任了。且不说现在“炒”红的人物，就是一时确为看好的作者，也没必要为之忙备历史桂冠。如前面说到到开国后的“十小诗人”，在现今的“当代”，其中不少早已被同代人所记不起来了。尤其是并不太远的汪国真同志，他的出现，是诗坛的一大奇观，针对诗由“朦胧”而到晦涩、灰暗，他诗的清新，通俗的明丽，打得前者落花流水，一败涂地。诗集一般已被拒绝出版时，他的诗是几十万地印，成为校园内少男少女手持的“圣经”。一阵风过去，他激流勇退，在诗坛淡隐，也“轻轻地去”了。这位年轻人书法、作曲都来，多才多艺，并不自视多高，过去了就过去了，也不在意。一上阵就将对方那么打了个落花流水，算在诗坛好好“玩”了一把。他那形同“五四”时流行过一阵的“小诗”，本是受泰戈尔(Tagore 1861~1941)影响的产物，可是，并不都能有泰戈尔式的哲思幽境。在它体积袖珍的容量中，不少乃有浅露的不足。对于诗有更高要求的读者，无法予以满足，可在市场经济中，是否还有别的原因呢？在诗坛，诗风的变幻无常中，诗的晦涩、灰暗能否卷土重来，汪国真，或不是汪国真的汪国真，是否又会神不知鬼不觉地来到呢？这很难说。从某一个角度看，其作品若一定要与汪国真论高低，也很难，崛起于上世纪七八十年代相交的特殊社会环境下的舒婷，她光彩，许多都是这一社会资源所赐，加以海外、国外有些口口声声反对文艺的意识形态化，却又死死意识形态化地对待大陆的文艺现象所对舒婷的舆论环境，使她比汪国真幸运多了。她婉约的诗风，对过去所谓“工农兵文艺”较相近而显单一的诗风，无疑是种冲击、批评，对诗的生态，是一种圆满，在新时期的崛起者中，她个人在生活中对诗的感悟，也是拔尖的。当然，伟大的时代，也需要诗的“大气”。若说李清照的婉约中可以读到“生当为人杰，死亦为鬼雄”的诗之大气的話，那么，“大气”二字在这里是不允许误会、歪曲为“假、大、空”的，如王之涣的“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从登鹳雀楼望“白日依山尽，黄河入海流”而豁然心胸、眼界为之开阔的感悟之哲思，在短短二十个字里，不是也有崇高于人生的“大气”么？所以说，舒婷是诗的生态中所

不应少的；忙于说别的，她还年轻。早在上世纪八十年代，他们的圈子里就有“Pass舒婷”“bye bye舒婷”之说。当时讲这话，确实过早，也太随意。狂飚时代的郭沫若、民族灾难深重中的艾青，在思想上，也是艺术上成为他们所属的一个时代的诗之代表。他们代表的，是时代，不是时尚。往下，写“下半身”而引起公愤的，还有写在厕所里手淫而一时闹得颇为“时髦”的，则更不在话下了。

一个时代，有不少“著名诗人”就不错了，不可能，也不应该要求都是大诗人。可是，在她色彩纷呈的诗圃中，若无有她的作品和作者艺术地呈现她那时代特征的精神而绽放她的艺术之花，那么，对于一部可以存史而有其明显时限标志的《诗库》续编，我不知当今动手是否为最佳时刻？

■ 据说台北商务印书馆曾有兴趣于这部书稿，为何又改变了主意？

○ 在此该明确地说，是余友梅先生在台北商务印书馆时，对此稿曾予以关照和厚爱。

商务印书馆，是解放前中、小学生人手一册的《王云五四角号码字典》编纂者的王云五所创办，是有百年历史、中国最老的出版社之一。蒋介石一度曾任王云五为财政部长、行政院副院长等要职。1951年到台湾，退下来后，还是回到商务。上个世纪二三十年代曾以巨资印过《四库丛书》《万有文库》等经典，对中华文化做出了他的贡献。到台湾后，他为“商务”购置了不少房地产，在文化日益市场化之际，他以房地产的收入，补助非市场化的书籍之出版，有他对文化的高瞻远瞩。去世后，由他侄女管事。他儿子退休后，自美国回台北，诚继父业。他从网上知道，并请到活跃、能干、年轻的出版家余友梅。余友梅听到台湾诗人施善继介绍了这部书，便将这部书稿要了去。

台北“商务”，是目前世界上唯一没有总编辑的、大大的出版社。每部书稿，都是分送给台湾各方有关的专家、教授所组成的编务委员会的成员，请他们提出审稿意见，以此决定稿件的处理。我有幸，稿子也经过这一程序。友梅老总告之，专家、教授一致肯定，评价甚高。没有什么问题。但，内容太“专业”了，台湾的市场太小，“商务”虽然不是跟着“市场”走，但也不能完全不考虑经济问题。这百万字，一竖排，得印五本，将全年要贴的钱，大部分都投在这部书上，可能性不大。若没意见，书稿留在那儿。待“商务”添置了可以少到印一本书的那种新设备，他们先印个三百部，投放到市场看看。出版家这样，我无法可说。以后，逢年过节，还来电话问候，为此，令人颇为不安。

今年春节，我节前主动先去个电话，不想她离开“商务”了，怎么走的，去哪儿了，回答全是“不知道”。问到书稿，也是新官不理旧事，一问三不知。请复印一份专家审读的意见，回答说：那是出版社的保密资料，存档入库。既然内地也有出版家对它有兴趣，只好请寄回书稿。这也是那方回答得最爽快的一句话：“好哇，立即照办！”

清理寄回的书稿时，发现少了多家的序言。这，我能理解，想是被有的专家抽去看时，忘了归还。如所序的诗人苏金伞，他的《地层下》《窗外》，在台湾的白色恐怖时期，是广为传看的，都是手抄本。在台湾说到他，诗名可比在内地响亮。再如绿原，他的《童话》，1949年渡海而去，后来成为著名诗人的，都是他们在军中初学写诗时熟读的范本。专家抽去他们的诗序，自然是由于早已熟悉他们而更关注他们。由此，也可看到两岸文化的血缘关系。新时期不少崇洋还认不了几个ABC，以模仿港台诗人作为时髦者，完全不知道他所模仿的偶像，有的反而是从大陆的，有的还健在的老诗人身上之所学。这也是诗的悲剧，令人深思。

■ 此书所集的诗序，是否可以看作《诗库》的一个简缩本？对于新诗研究、对于中文系师生、新诗爱好者有其实用价值！

○ 《诗库》主要以入选的诗人之作品为主。每位诗集的序言，篇幅不及作品的十分之一。它是《诗库》的一部分，不可能有替代作品的作用。却能帮助解读作品。

谁需要这种解读的帮助呢？自然是爱诗的人，他可能是文科师生、新诗研究者，也可能不是。北京《诗刊》一度发行到一百多万份。那时全国人口只是现在的一半多点，一本《诗刊》也绝不止一个人读，而他们，又绝不可能都是与诗有关的专业人士，所以，它的主要读者，还是新诗爱好者。他若爱哪位诗人到很热的程度，想尽办法找有关的资料都是必然的。但兴趣要广到那么多流派，那么多时段的诗人，则可能要与专业相关了。

人在青少年时，不论是否学诗，是否自觉，都有一个诗的青春。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我介绍过那么多诗人，书销得那么好，主要读者，也是他们。今天的年轻人，随着大的环境在市场化的变化下的变化，也许不完全（是完全）像过去了。只要这种人还有，他们仍然可以是此书的读者。

■ 书中的史料，当然是与史俱在的，正因为他们过去了，成了历史了，和现在的距离越来越远了，将它蒐集、整理在一起，自然是繁琐、辛苦的工作，怕也像考古工作者所出土的文物吧？

○ 新诗历史还不够百年，中国百年间的战争、动乱、变迁、加以过去并没有保护它的机制，散落四处，有的根本不可能知其下落。我虽有心，却不是旧事的当事者，作为当代人，想知道那些事，又不可能知道当中可能有些什么有关资料，要想找它，圆满它，确像“大海捞针”。但与考古者在山道荒漠寻其千年前古人的足迹，相对要好多了。半个世纪前，刚成年的我，就混在这个文艺圈内，且有“诗的青春”，巧逢其时，新诗开创前期的俞平伯、冯雪峰、汪静之、郭沫若等都健在，稍后二十世纪二十年出道冯至、梁宗岱，三十年代当红的田间、艾青、卞之琳、李广田、林庚，乃至“非主流”的“新月”之孙大雨、陈梦家，“现代”的施蛰存、徐迟、金克木，乃至“九叶”当中好几“叶”还没见过的，他们之中的代表诗人穆旦等，同我都有些交往，有的，还有忘年之好。方便了我蒐集一些过去了多少年的资料，手头也出了不少“出土文物”。

如闻一多，过去只知道他写过《红烛》《死水》，承他夫人高孝贞为对付“北图”只允许捐出文物的亲属方可查阅它的规章，还特地开出冒我为闻先生的外侄之证明去的。我在其中偶见先生手抄的《真我集》，多日分次把它抄好了带了出来。胡也频的手稿，也是丁玲同志开了我为亲属的证明上历史博物馆的，馆藏太丰富了，找了半个月也没下落。过年，我住在垂杨柳那幢文化人的大楼，全给叫出来打扫环境，中间休息，平日同住一楼，互相毫无所知的邻居攀谈起来，才知身旁的一位万岗同志，不仅是博物馆的，而胡也频的手稿就在他手上。真是踏破铁鞋无觅处而喜出望外了。他问明我的证明所交之处，几天后就交了两份复印、装订好的诗稿，其中一份，叫我送给丁玲同志。《戴望舒诗集》中的《无题》在这之前也是从未公开过的，是偶尔从别人口中记述下来的。“七月”诗人阿垅，若无所谓“胡风反革命案”，且是主犯之一，他有的诗，怕还不会那么为人关注。他写悼念亡妻张瑞的长诗，若无此案，在整体的政治空气下，即便有阵地，也不会拿出它来，必为历史所淹没。我也是在公安部发回他抄去装手稿、剪报的小皮箱里看到而抄了下来的。那时复印不可能大众化，北京饭店扩彩照和复印，都是一元一张，而美元和人民币正是一比一。若非护照或极为重要的合同、契书，谁也掏不出那么多的钱来复印的。殷夫的《孩儿塔》，鲁迅的序言已将读者的目光对它引向了新的高度，作者遗照木纳的神态，写的诗之革命，牺牲之壮烈，都很难找到作者生前请白波为诗所作的，全是人体素描的插图之有机联系。我知道可以找到，买下它用照相的翻印版，虽下狠心，若不是当时出了好多本书，用几个月工资的代价买它，舍得也不能不吃饭。

这些成果，本应用于读者。但，有的人，如有关戴望舒多种版本的书，

连我写的注文都是一字不漏地抄上去，那不可能是别人写的，却不作一点说明。被侵权，我未采取过任何护权行动。但集中它于《诗序》中“抖落”出来，这“文物”又是我本人用劳动“出土”它的，总该有点意义吧！

■ 请问，你是如何处理跨现、当代的名人名诗的关系，请示例说明。

○ 此事，在回答上述几个问题时，有的地方也提到过它。这里，以上世纪五六十年代誉之的“四大诗人”为例。如郭小川，他出道很早，1938年就写诗了。若无他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被称之“四大诗人”之一的作品，仅凭早期的习作是无法作为“五四”后某一时段，或历史时期有其诗的影响者而入《诗库》的。可是，由此确认了他诗人的位置，为了理清诗人的文化渊源，说明他成长的过程，自然也就无法避开他最初穿诗的开裆裤之形象。属于这“四大”的另一位闻捷，情况完全一样。“四大”的另一位李季，解放后又成“石油诗人”，专写油矿的矿工生活。死后的遗体都戴着铝盔，圆其遗愿。历史，有时会圈一个怪圈，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他用民歌体写的长诗《王贵与李香香》为时代所需的艺术探索，已被上下肯定，在诗，在艺术，在文化史上供人研究、琢磨，它成功、荣誉的光环同时成为人们眼中难以逾越的纪念碑时，若非再有为民族化、大众化，样板式的《王贵与李香香》，也很难再为评论界说些什么。但有部《王贵与李香香》奠定了他的地位，作为诗坛的一个“人物”，不论视成视败，都不能仅以一部成名作说明他诗的一生。何况他的“石油诗”，总体都是那个年头水平之上的作品，如《报信姑娘》还可以多加几十分。“四大”还健在的贺敬之，情况就没有这么复杂了。他一出场，亮相之作，就受到大后方诗的权威理论家胡风看重，若《白毛女》除去音乐部分，看作一部诗剧，其影响则更大了。在当代，他的《雷锋之歌》《西去列车的窗口》已被誉为“开一代诗风之作”，诗人的诗名，前后基本在一个水平，这给我们编辑很大的方便，选作品无需太费事。

■ 你是如何选定进入《诗库》者的诗人的？是以其作品在诗史上的地位，还是以诗人的知名度？

○ 一部新诗史，以及任何历史，都不可能只是一伙天才俱乐部的成员所写的智慧“圣经”，虽然后人会用智慧去读和读出智慧来。它必然记述到许多不同人物的历史足迹，然而，涉及到新诗运动中而可记述者，可能没写出过什么可称经典的作品，可总还是在特定的历史背景下于诗运中的人物。所以这两者原是都需要考虑的，也应该是统一的。我理解你将它分为两个问题来问，正是它在现实中往往不是统一，而是分裂的。如过去文艺配合任务的年

月，有时为一时所需的实用主义，为此可以将作品和作者“炒”得很火，其实不是那么回事。过去，常说诗文需要时间的检验。文艺评奖，自然也要评出一些绕不开的好作品，但是，从目前的情况看，怕也很难以它看作品的价值。早在二十年前，媒体爆出巴(金)老对诗集评奖的一句“评委自己评自己”的话，南北哗然。近年，媒体曝光的，类似“买官”的“买奖”，乃至直接花钱买“奖”的，还有我给你疏通评委投票，你解决我之所需的“权”、“奖”交易的丑闻，即便不是当场，也是事隔不久就传开了。结果，与作者所想得到的恰恰相反，而且“立竿见影”。商品造假，在我们生活中已为常事，有的还是真能蒙人。但白纸黑字的诗文，全都明摆在那儿，弄了假，也像假得吃了中毒的食品一样，瞒不过人的。境外，有些很会利用国内哪些名为“开放”而崇洋的人，吹捧那些不健康，乃至有问题的东西，意识形态化地冲击你文化、道德、伦理的价值观为其实用。国内一呼应起来，恍惚“皇帝”还真有那么一件“新衣”。事过之后，后人更不能以臆想的“新衣”，自欺欺人。

《诗库》是以“五四”后新诗运动发展过程的生存状况来说明它可以和应该能说明的一切。如开创新诗的第一人胡适，不是以今日的审美要求看它，当年，不仅别人对他的《尝试集》有异议，就是他自己，也说它不是诗。可他一代宗师的地位是无法否认的，无法不选他。民族危亡的时刻，徐志摩和现实太不合拍了，那时也不可能利用什么行政手段，是东三省沦陷的民族血泪，将徐志摩那“温柔的一瞥”极为自然地扒到一边。这点，看到前几年美机轰炸科索沃，愤怒的群众在街头以诗声讨轰炸的野蛮和侵略的诗句，从中就可深悟到两个不同的历史时期和国度，它们会有那么相近相似的人性之深刻。战前的“新诗研究会”成员，除蒲风，文字较粗糙，多标语口号。“新诗研究会”的主将之一任钧长寿，前几年才去世。我们还有过一些来往。晚年他同意我“诗就是诗”的提法，悔恨早年自己写的“不算诗”，若说这是他个人沉痛的教训，也是新诗运动的沉痛教训，但，它还是一个历史时期的主流现象，有些活跃其中的诗人，并未有诗史的经典名作，知名度不小，不完全是正面的，以“新诗运动发展过程的生存状况来说明”诗史为已任的《诗库》，是无法空白这一页的。

■ 入选的101位诗人属于不同流派，你是如何评述他们各自的归“流”划“派”的？

○ 这个问题，说理论，不如道事实。胡适是“新月社”的创始人之一，可是从来没有任何人将他看作“新月诗人”。若照朱自清那么将“新月”称“格律诗派”，他不仅不“格律”，而且他散文化的遗毒，成了诗运中的一大诗害。他的

文字风格，与别的“新月诗人”无法搭界。“创造社”的主将郭沫若，以其《女神》为中国新诗开了一代浪漫之风，然而，同属“创造”的王独清、冯乃超、穆木天，则被称之为“象征诗人”，难以和郭沫若捏合在一起。可朱自清、艾青，对王独清的“象征”，又是持怀疑态度的。近到现实于眼前的“朦胧诗”派，虽然他们不属《诗库》范围，以其为例，也可以说明这个问题在中国今昔皆然。食指作为“朦胧诗”的先行，下笔从不“朦胧”，欧阳江河，则近乎有点郭小川的气势了。现今研究得很热的“九叶派”，其实，这九位诗人，有的，相互都没见过面，不认识，战后有机会一同在《诗创造》《中国新诗》发表诗作，并诗风相近，应该说有“诗缘”。所谓“九叶”，是以上世纪八十年代出了本九人的合集《九叶集》而来。现在研究他们在此书出版前三十年，抗战胜利后的创作活动，却列为当时还根本没有所谓“九叶”称谓的“九叶”来研究，这就不知道其研究是根据什么而来的“研究”，真是太“神”了。

艾青有名言：中国无流派，只有宗派。此话要是说绝了，归“流”划“派”中做绝了，后患无穷。但它针对几千年的封建社会留给“当代”社会生活的封建余毒难以消除这一事实而言，又是很深刻的。当年，胡风一打成所谓的“反革命”，跟他有投稿关系的作者，虽然也有关系较为密切的，可不是“一锅端”地打成“胡风分子”，没戴帽子，也不是“审查”了许多年么？完全是封建式的株连。“创造社”为它的主将郭沫若的社会地位日升，写文学史的提到“创造”，似乎也得另眼相看。我自己对鲁迅的敬仰是绝对的，创造社一些同志年轻时，太嫩，说错了一些话，惹怒了鲁迅而被严词地批判，几十年过去，他们也是认错的，为确立鲁迅的权威，说到旧事，这些同志都抬不起头来，这样，怕也不能看作对鲁迅真正的敬重。我想，鲁迅若健在，是绝不会喜欢、允许这么对他的。

文学创作，绝对是非常个性化、个人化的劳动。任何诗人，都该是个独立的存在，是否值得研究，都该照他自身独立存在的价值而定，不能搞“流派”的人身依附。现在，有的诗人，在评论、研究中，已不是以他作品，而是为他所依属的“流派”而存，本末倒置，极不正常。

“流派”本是指在一定历史时期内，文学见解和艺术风格近似的作家，自觉或不自觉地结合。只能是在一定的条件下，在一个时段，相聚活动的小群体。现在，我们则简单地以一些文艺社团的招牌当它流派的标志，如前所述，许多都是脱离实际、名实不符地在搞几个人的江湖游。《诗库》中叙述到一些个人的经历，有的是生活无着，因同乡，或其他关系介绍到社团栖身，若以此即可伙成“流派”，则有些江湖的行帮色彩。

为此，《诗库》是——